

室覽聞師教

103089

大學生用書選譯

Frank Luther Mott 著
張羅 逢沛合 築 譯

美國新聞事業史(下)



世界書局發行
教育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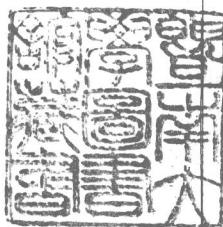
G 219.712 613

2
791

106089



大學用書選譯



教 育 部 出 版

美 國 新 聞 事 業 史 (下)

Frank Luther Mott 著
張 羅
達 沛 合
譯

90095411

AMERICAN JOURNALISM

by

Frank Luther Mott

*Copyright 1950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U. S. A.*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COLLEGE TEXTBOOK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China

1960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再版

大學用書選譯 美國新聞事業史（全二冊）

平裝本 基本定價 伍圓伍角整

著者 Frank Luther Mott

譯者 羅張

印行者 吳教

出版者 逢育

印刷者 世界

書

沛堃先部局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三一〇一八三一號
本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版權所有
必究

第七篇 獨立報紙的興起（一八七二——一八九二年）

第二十五章 紐約新聞界卓然的領袖

一八七〇年代是美國出版物在數量上突飛猛進的十年。報紙的數目在這些年當中幾乎加倍了，至一八八〇年達到約七千。在同時期內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且雖有財政上的萎縮現象，這十年中的報紙仍然增多了。

八十年代報紙的增加率與人口的增加比較，稍呈低落，到一八九〇年左右，美國的報紙超過了一萬二千之數。

西部的發展，南方經濟狀況的改善，及報紙的風行於全國均有助於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八七二年美國新聞記者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ist）上說，「新聞敘述範圍愈形廣泛。」美國的報紙有如洪水的氾濫，「把它的民衆教育擴展到全國，千言萬語地報道，一切重要以及通常的事件，藉廣告對商業予以刺激。」隨一切現象的複雜性增加，我們要追尋發展的主脈更感困難，我們切不可由於太輕率地概括而趨於過分的簡化，因這種概括法是有害於歷史研究的。

獨立報紙的成長

那時代的新聞事業有一個顯著的變遷，就是它由政黨的支配下脫離出來。一般的新報紙均離政治的控制而獨立。將近一八八〇年，刊物目錄上所列舉的報紙，有四分之一是屬於「獨立的」，「中立

的」，或只是「地方性的」；到一八九〇年，其比例達到了三分之二。

這種變遷的主要理由是重點的推移，由社論的時評與偏於政聞的報道轉到更廣泛的新聞範圍及更密切的人類興趣。這種新聞觀念的改變將報紙由政客方面攫去轉移到記者手中了。無疑地，政黨束縛的鬆懈與政黨忠誠的放弛均大有助於報紙的獨立，然而這種助力也許是互相有關的——就是，因大眾化廉價報紙的出現所引起報紙功能的改變大為削弱原來政黨的團結。黨派的報紙畢竟是使令黨員信服忠實的一種主要方法。

在這時期有許多論及新聞獨立的文字。繼葛利萊任紐約論壇報編輯的雷德（Whitelaw Reid）在他的主管逝世前不久曾寫了如下的評論：

新聞獨立！那是同業前途的口號。因有害於政黨而行隱藏的終結；片面說的終結……那種我們不能相信是完全公允的，但政黨鬭爭的危局要求的攻擊的終結；終結那明知為誹謗的誹謗……勿遲疑於刊印也許會傷害政黨的新聞……輿論報導改竄之終焉……半屬真實記事之絕跡……這就是一種新的有益的獨立宣言所提供的每個困惱而公正的記者的目的。

這一段評論裏面沒有提到中立，或關於否認本黨候選人的推薦。雷德相信脫黨的自由，但是他沒有應用那種自由。黎德和許多其他提倡新聞獨立的人們所主張者即在黨紀方面容許他們在黨內有批評黨的政策與領袖的自由。

這樣的編輯脫黨總是可能的。但那些實際脫黨的即屬於另外一類了。一個在新英格蘭風行一時的輕蔑的名稱在一八七二年被印第安納波里斯前哨報（the Indianapolis Sentinel）應用到這些人們；

它稱他們是『獨立行動的黨員』，這個名稱後來被鄧那（Dana）在紐約太陽報上採用，並流行起來。他們是背棄者——不忠實的，不合理的，並不復可靠的份子。但是鄧那本人終於變成了一個獨立行動的黨員；他如何隨時勢而轉移，那是很難說的。

在一八七二年幾種重要的共和黨報紙拒絕支持格蘭特（Grant）再行競選。但在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〇年大多數這些報紙又重行合作。一八八四年克利夫蘭（Cleveland）及布蘭（Blaine）的競選運動之際，在共和黨報紙中發生了前所未聞更大的反對本黨候選人的運動。領導着反對布蘭爲候選人的是紐約時報和晚郵報（the Evening Post），費拉得費亞時報（the Philadelphia Times）及紀事報（Record），波士頓廣知日報（the Boston Daily Advertiser）傳錄報（Transcript）及先驅報（Herald），春田共和報（Springfield Republican），布魯克林聯合報（the Brooklyn Union），哈普氏週刊（Harper's Weekly），國民報（the Nation），及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這種背叛顯然是劃時代的：無論其會與那組織如何密切提攜，再沒有任何一種報紙反對政黨的候選人這樣嚴重的。

無疑地，對於政黨束縛的輕視之所以促成，是由於漸漸覺察到大多數成功的報紙——屬於新新聞事業的那些——就大體說，都是輕侮黨派控制的報紙。懷特（Horace White）甚至說，『所有各報紙業務繁榮的增進與它們主張它們的獨立和自由成正比例』。懷特和許多他的同行編輯們相信讀者大都不願被捲入一個政治陣營裏面去。春田共和報的波爾斯（Samuel Bowles）看到了『那些自由思想的獨立選民是一班新的群衆，他們經由日報和週刊而發現他們的領袖人才與他們的思想表現』。他認爲『報紙是輿論的呼聲，而不是輿論的創作者』，『一個真正新聞記者的考驗是他對於輿論的趨勢觀察

得迅速和表達得正確的能力】。

但我們不要誤會這個時期的政治獨立。多數報紙仍受黨紀的支配。而且許多編輯雖久已侈言獨立，但討論到黨派的爭執時，總是遵守黨規的。當然，舊黨報的最壞弊病是使令新聞帶着某種色彩並造成某種形式以支持政黨的態度——這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普遍的現象。

社會改進運動

昔日傳統地為政黨的鬭爭在若干事例中已被一種新活動取而代之了，就是新聞事業的注重社會改進運動以圖糾正地方上的弊端，並促進社會福利的某些方面。當然，這方面的努力在過去不是沒有過，如紐約時報與特威得 (Tweed) 徒黨的鬭爭，芝加哥論壇報 (the Chicago Tribune) 的反對水由地方專賣，和勒斯里報 (Leslie) 的堅決反對紐約的有害牛乳都是顯著的例子。但是現在社會運動佔着一個異常顯著重要的地位。紐約論壇報於一八八一年開始發起新鮮空氣基金；紐約世界報 (the New York World) 募款建造自由神的臺座，其免費冰凍與免費治療基金，以及對於專賣和收賄者的攻擊；紐約先驅報 (the New York Herald) 從事於同樣的運動；堪薩斯市明星報 (the Kansas City Star) 的公眾改善計畫；匹茲堡日報 (the Pittsburgh Press) 從事對青年的社會工作；芝加哥每日新聞 (the Chicago Daily News) 倡設新鮮空氣療養院；舊金山紀事報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公衆計畫，及同市考察報 (the Examiner) 的救恤活動——這些不過是代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許多非政治性運動的少數幾個例子。

一切反對市政腐敗的政治性運動大體上都是獨立的；它們傾向於代替昔日的黨派活動。南北戰爭

H. W. H. 1935

以後城市的徒黨與幫會被控制了，此爲前所未有的。各報紙常常領導着抵抗他們的改革運動。對於特威得徒黨的攻擊，費拉得費亞時報對於該市收賄者的鬭爭，和聖路易環球民主報（the St. Louis Globe-Democrat）反抗威士忌酒徒黨的運動都是七十年代主要的插曲。當蒲立茲（Pulitzer）將種種反對地方弊端的運動技術帶到了紐約之後，他就重演一種新聞事業上的新局面，此乃其本人在聖路易與斯克里帕斯（Scripps）報紙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與克利夫蘭（Cleveland）所實行過的。

自一八七二至九二時期中在紐約新聞事業史上的主要事件是蒲立茲的侵入該領域，適在那時期的中間，他承買了世界報，並影響於其他各報的銷路，價格，和新聞以至編輯政策。他所倡導的一切辦法不久就被稱爲新的新聞事業。蒲立茲的事業固須注意，但要深切地了解，必須首先檢討紐約其他這類報紙如新聞報，太陽報，論壇報（the Tribune）晚郵報，及時報在這時期發展的經過。

七十年代的紐約先驅報

小卜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 Jr.）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繼任主持紐約先驅報的管理處。雖然他是一個腐敗乖僻的人，並且留在國外的時候很多，可是正當鄧那的太陽報在七十年代突飛猛進之際，他的報紙並沒有喪失它的勢力；在蒲立茲來到該市以前，新聞報的獨特地領導地位並沒有搖動。一個對於新聞業情況眼光敏銳的觀察家在八十年代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一八八三年以前整個時代中，先驅報在新聞的採訪和出版方面沒有一個勁敵。它用了很多的錢，沒有其他的報紙以前曾經夢想過的……在國內雇用了較任何一家報紙更多的訪員和通信員，給予他們更優厚的薪金；其國外專電載滿了各頁，而紐約其他報紙的專電只佔幾欄而已。紐約先驅報除了任

何其他頗足稱道的特點而外，登載一切的新聞，這是當時紐約任何其他報紙都辦不到的，該報此項特點不但在美國就在歐洲亦爲人所共知的。

史坦利與立溫斯

並且先驅報在少年卜內特管理之下玩着精彩的『把戲』是很成功的。卜內特宣稱，『我製造新聞。』第一個最大的成就是史坦利 (Henry M. Stanley) 著名的遠征到非洲腹地去找立溫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史坦利的原名是羅蘭次 (John Rowlands)，一個英國人的棄兒，飄流海上，最後幸獲一個新奧爾良的富商救援了。當他的保護人逝世以後，青年羅蘭茲就改用他的姓名享利·史坦利。史坦利在南北戰爭的時候，他閱歷了許多各種的經驗，是時他寫了他的第一篇新聞通信。史坦利於戰後試探去到西部，後來又去小亞細亞；然後他回到美國，爲聖路易環球民主報報導西部印第安人的戰爭消息，每星期獲得酬報十五元和一切費用。藉着這種新聞上的成績，他說服了卜內特聘他充任先驅報的戰地通信員，於一八六八年隨納披爾 (Napier) 將軍參加遠征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國王狄奧多 (Theodore) 之役，由他自行負擔一切費用。史坦利對於這第一次指派的重要工作有着特殊成績，頗爲一般記者所敬佩，於是被正式任用爲先驅報的巡迴國外通信員。

當時有一位傳教士兼探險家立溫斯敦忽告失蹤了，多年來歐美的讀者對於他在報上發表的他在最黑暗的非洲旅行的報告，非常感覺興趣。他原前往尋找尼羅河 (the Nile River) 及剛果河 (the Congo River) 的發源地；但三年沒有得到他的直接消息。沿海城市有時謠傳他尚在人間，並需要救濟。這是

全文明世界頗感關切的一個謎。卜內特在數年前繼他的父親退休後接管先驅報，他對於這事件認為是一個新聞上的大機會。他即召史坦利在巴黎與其晤談。在這位通信員的日記裏面寫着有他們的面談情形：

卜內特先生問我，「你看立溫斯敦在什麼地方？」

「我確實不知道，先生。」

「你看他還活着嗎？」

「他也許活着，也許不會活着！」我回答說。

「啊，我想他還生存着，並且可以把他尋找到，我將派你去找他。」

「什麼！」我說。「你真的認為我能够找到立溫斯敦博士嗎？你的意思是要我去非洲中部嗎？」

「是啊，我打算請你去到你聽見的他所在的所有任何地方去找他，設法採訪關於他的所有一切消息，並且或是」——他從容審慮地自己說——「那個老人也許正需要救濟：帶着足夠的一切東西去幫助他，如果他需要的話。當然，你照你自己的計劃去做，實行你認為最好的辦法——但是要找到立溫斯敦！」

英國的皇家地理學會原贊助立溫斯敦去探險的，現沒有錢能夠派一個遠征團去找他。卜內特一本先驅報向來對於新聞上的重大妙策一經決定後，慷慨從事的獨特作風，特准史坦利每次可用該報款項五千元，儘他所需，可以支用；「但是，」這位發行人說，「要找到立溫斯敦！」

他們的約會是在一八六九年的秋季；到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史坦利經過許多困難才在贊穆巴（Zanzibar）裝備好了一個遠征隊，由三個白人，三十個武裝的土人，和一百五十頭成群的馬匹組成。

經過了六個月的時間橫過赤道非洲溼地；因熱病流行並與土著酋長戰鬪損失了一個白人，大部分土人和差不多所有成群的馬匹。經整編後的遠征隊續向湖沼區域前進，再旅行了兩三個月，史坦利始從友好的黑人方面聽利一點消息，據說有一個白人在坦干伊喀湖（Lake Tanganyiki）附近的烏機機（Ujiji）村中病了。

史坦利和立溫斯敦在野蠻的熱帶地方會晤經過，在此以前白人尙毫無所聞，不久便為全世界的報紙讀者所熟知了。那時候土人注意到這有劇情的事件，當史坦利跨大步走向那憔悴的老傳教士面前時，大家都瘋狂似的唱歌擊鼓。

我脫去我的冒狀帽，向他鞠躬，並用尋問的話調說，『立溫斯敦博士，我想？』

他誠懇地微笑着，舉起他的便帽，並簡單地回答說，『是的。』

這些致敬的話固然是很平凡的，竟然各處都認作是那一代一個大探險故事的頂點，那談話變成了平常引人注意的字句：『立溫斯敦博士，我想？』『是的。』

這個先驅報的探險不但確是七十年代一個主要的報紙功業，却是新聞事業史上一個重要英雄故事。後來史坦利報導非洲的情況，兩年後在立溫斯敦死後，由新聞報與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London Daily Telegraph）聯合贊助之下，他擔任前往中非探險的未完工作。他橫過大陸由東而西，溯剛果河而上，由河口以至發源地，卒組織了剛果自由邦。

少年卜內特與他的報紙

非洲不是先驅報代表所達到的唯一探險區域。第琅（De-long）的北極探險隊却很不幸，一八八

一年夏季他們的船因與冰相撞沉沒，隊員全部殉難。氣球飛行的實驗和考古計劃亦由先驅報主辦的。

一個較史坦利更冒險的通信員就是麥克加亨 (Januarious Aloysius MacGahan)。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六年擔任先驅報的歐亞戰事訪員。他的特殊成績就是他騎馬旅行通過亞洲中部沙漠，追上正向基發 (Khiva) 前進的俄國陸軍蹤隊。在這個偉績中他公然反抗沙皇和負責將官的命令，一方面逃過了哥薩克人 (Cossack)，另一方面越過了突厥人 (Turcoman)。他是於該城市陷落時唯一在場的通信員，最後他和俄國軍官成為友好了。麥克加亨的最大成就是他的一連串的通信，報導關於保加利亞的兇暴情形，因此引起俄土戰爭，但這個工作是替一家英國報紙做的。

先驅報的一個最精彩的『把戲』是轟動社會的所謂『野獸的戲弄。』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一的早晨，先驅報的整個前頁均登載中央公園動物園的野獸完全逃出的詳細消息，『野獸與市民的惡鬪，』『殘害的可怖景象，』『令人震驚的安息日大屠殺』——在這裏只引用幾個大標題。關於獅、豹、虎、野貓、象、蟒蛇和一切野獸所肆虐的殘殺均以流血的寫實細述在報上，以致全市陷於恐怖狀態。州長狄克斯 (Dix) 把孟加拉虎射死在街頭的英勇行動沒有使驚慌的紐約市民安定下來，許多市民看到報紙之後即在他們門前趕築防寨阻絕起來，另有許多人武裝起來，走到他們門前廊下準備作大規模的狩獵。當然，有少數人頗有耐心把那冗長的小字體的報導直讀到末尾，發現一段這樣的說明才放心了：

上面所登載的報導純粹是虛構的故事。沒有一個字是真的……這不過是數日前記者漫遊到中央公

園的獸苑，正注視着野獸籠鐵條裏面的野獸，因在他的腦海裏充滿了一種幻想的情景。紐約究竟如何準備去應付這樣一種大禍害呢？這種情形會多麼容易發生在一週中的任何一天呢？……

小卜內特雖是一個多留寓在外的編輯，從沒有放棄他的督導責任。他很精明機警，且往往很大膽。同時他是一個傲慢自大者，一個專橫的雇主，自己放恣自負。雖然他承繼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報紙，管理了半個世紀，他在新聞事業上留下很淺的印象。大規模的遠征計劃由一家資本充足的報紙加以贊助，這是他的唯一貢獻。他對於他的人員，持輕蔑的態度，時而雇用，時而解職，決於他偶然的怪念。他常常喚召他的職員到巴黎去參加會議；當負責的編輯有一次表示異議，認為有一個被喚召的人員在職務上是『不可缺少的，』卜內特電囑將認為同等重要的人員開單送上，他於是將他們全部解職，他說，『在我雇用人員中沒有不可或缺的。』他愛好香檳酒，但飲下兩盃會令他頗有醉意；關於這少年卜內特酒醉後的故事很多。他有一次酩酊大醉的時候，他忽想起他父親舊日的反天主教主義，即命令他的秘書寫一篇抨擊天主教堂的社論。他的秘書遵照辦理，標題是『教皇該死，』他頗為嘉許；並於他興奮之餘，獲悉已往此類文稿沒有依照命令電發，他自行前往電局送發。但他謹慎的秘書即行撤回，當卜內特發現後深為感謝。

在七十年代因轟動社會的大事件所刺戟，先驅報的銷數有時增到十五萬份。在一八七三年以後數年中通常銷行約十萬份，自一八七六年該報每份的售價自四分減低到三分錢後，銷數相當增加，超過那個數目，較二分錢的太陽報的銷數尤多。但先驅報於一八八三年與蒲立茲的脅迫相競爭的時候，自行減低售價為二分錢，它的銷數却沒有達到比例地增加。它的銷數最高點是在一八八五年達到十九萬

零五百份，蒲立茲的世界報在次年竟超過那個銷數，並且由此蒸蒸日上。

當先驅報在七十年代中間減低每份售價的時候，一般報販以爲對於他們利潤的削減不合比例，力持異議；但是卜內特強迫他們接受他的比率。當他的報紙於一八八三年減售兩分錢之後，報販於每分錢祇能獲利三分之一，而在其他兩分錢的報紙，報販所得可合半分以上，於是發動有組織的對抗，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集會反對貝涅特與先驅報。究竟世界報會給予這些示威運動多少援助，殊難斷言，但它當然儘量刊佈關於他們的新聞。卜內特電告他的指示方針，以抵制那些報販，並設置五百個報攤專發售先驅報，都依照他的指示做了；但該報由它的減價得到很少的利益，直到一八八四年夏季它私下和那些報販妥協以後，情況始較好一點。

當它於一八八三年削減它的報價以抵制世界報的時候，先驅報提高它的廣告刊費。三十年來它經營美國報界最大的廣告業務——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在世界報及其他報紙改變了舊例以後，貝涅特仍堅持長用着第七號活字和單欄格式。因此世界報的廣告業務及其銷路在一八八六年間都遠駕於先驅報之上。祇有分類廣告的營業，先驅報仍首屈一指。

在社論方面該報沒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其社論主筆均屬卓越人才。卜內特是完全超然主義的黨員，他是著名的慣於支持他所相信最有希望當選的候選人，姑不論這一點是否值得爲人所稱道。

據估計小卜內特曾用先驅報的款項達三千萬之多供其一生的揮霍。當一九一八年他逝世時，該報正遭虧本。

鄧那與太陽報

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八日正值海斯與狄爾登 (Hayes-Tilden) 選舉爭論激烈的時候，紐約太陽報銷售二十二萬份。它聲稱這是向來沒有任何美國報紙可以匹敵的一日銷數。在前一夏季它的每日平均銷數已達到十三萬二千份，但到一八七七年它的銷額復大為降落；先驅報的售價減低後，它的銷數超過太陽報約一兩年，到八十年代的開始，這兩種報紙的銷數總在十三萬到十五萬之間，各不相上下。這是鄧那的太陽報所達到通常銷數的最高峯。它與蒲立茲的世界報相競爭頓遭挫折；到八十年代的晚期，它的銷數遽降到八萬份，以後數年並無增減。到一八八七年它由傳統的四大頁改為八小頁沒有促進它的銷數。

太陽報繼續是一種撰述精當的『新聞記者的新聞紙。』它在新聞陳述上的文學風格恐非任何大白報所能及，不過也不無有許多地方是顯然帶有煽情意味的。該報的新聞方面多年由兩位大記者指導着——一位是羅德 (Chester S. Lord)，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任總編輯；另一位是葛拉克 (Selan M. Clarke)，自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任夜市編輯。像他的訪員所愛稱的『老總』葛拉克，被公認為是這一行中一個新聞工作的最好導師。兩位傑出的記者籃爾夫 (Julian Ralph) 和伯立斯本 (Arthur Brisbane) 都是他的學生。葛拉克和羅德在新聞寫作上的良好影響是很深長的；影響所及，無遠弗屆，深為各處愛讀該報者所嚮往。

在紐約有些兩分錢的報紙，專事模倣太陽報簡潔優美常是動人觀感的文體，突現於八十年代初期，終至歸於消滅。

太陽報與先驅報一樣，在這幾年間獨立於政黨控制之外。它的路線也不更堅定。鄧那的偏見和憎

惡使令太陽報的社論方針帶上一種很重的色彩。無疑地，色彩和漂亮是他所希求的。因他是狄爾登的一個熱心擁護者，值海斯秉政時代一直追迫着他，幾乎每天在報上反復用着這樣的性質形容詞，如『海斯先生他的欺詐』和『欺詐的行政首長』等。在一八八〇年他給與民主黨候選人韓科克(Hancock)將軍同樣譏諷的好評，如八年前他給與葛利萊一樣：鄧那寫着，『他是一個好人，體重二百四十磅。』好話比公然的反對有更大的損傷。當一八八四年他支持傑出的巴脫勒(Butler)以抵抗克利夫蘭與布稜的時候，他也是帶着譏諷的，巴脫勒在紐約市祇得到三千五百票。他對於巴脫勒的支持實在是反對克利夫蘭，對於巴脫勒的候選資格他亦不以為然。鄧那在一八八八年却贊助克利夫蘭，但到一八九年忽轉變再反對他。太陽報社論頁所表現的特性是擁護保護貿易政策，反對坦馬尼派(Tammany)，近於主張武力對外政策者的美利堅主義，反對罷工，及維護一般的商業利益。

雷德與論壇報

紐約論壇報從一八七二年格蘭特——葛利萊(Grant-Greeley)競選運動中出現創鉅痛深，搖搖欲墜。它的名編輯心神交碎，即於是年歲尾以前逝世。許多讀者把葛利萊看作是論壇報，就沒有意料到該報還存在着；因此有關於一個內地農民的流傳故事，那位農民在二年之後聽到有人提起論壇報，就驚歎地說：『論壇報？怎麼啊，還出版嗎？我以為葛利萊死了！』他會有這樣一個印象是有原因的：論壇周報的銷數竟減少了一半以上，而日報也減到四萬份，還是每況愈下，直到後來稍有轉機，至一八九二年，即本時期之末，該報銷行七萬五千份。

因論壇報是屬於一個股份公司的，關於葛利萊充任編輯的人選問題引起激烈爭論。全國加以注